

分类号:

类号	26.304
登记号	27736

密级:

UDC:

学 位 论 文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China

陈 星 灿

指导教师: 安志敏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申请学位级别: 博 士

专业名称: 新石器时代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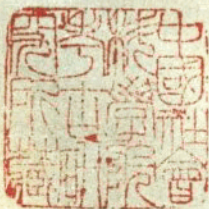
论文提交日期: 1991.5

论文答辩日期: 1991.6.11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1991年 月 日

4
36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

内 容 摘 要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探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和早期发展史进行初步的总结和研究。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导言——关于史前考古学的若干一般问题》，分别探讨了史前考古学诸概念特别是“史前”一调的由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简史、意义和分期等问题。把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分成萌芽期(1895-1921)、诞生期(1921-1931)、发展期(1931-1937)和继续发展期(1937-1949)等四个时期，并对各期的特征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归纳。

第二章《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萌芽(1895-1921)》，共分五节，第一节总结了在二十世纪初期以前流行的中国文化外来说种种，并对它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文化西来说虽然十分浅薄，但在客观上却刺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第二节概述了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常识在中国的传播；指出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考古学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为考古学的发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第三节力求客观地评述了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认为这些活动不仅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有刺激和促进作用，而且也为中国上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本文以1895年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的史前考古活动作为萌芽期开始的标志。第四节简述了金石学的发展历史，特别指出西方古典进化论、实证主义以及甲骨、竹简等古代遗物的出土对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金石学虽然同史前考古学关系不大，但它向考古学的转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史前考古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五节举例说明中国古代对史前遗物的发现和认识，但由于史前遗物历来不被金石学家所重视，所以著录很少，也往往没有正确地给予解释，不过，罗振玉对殷墟石斧的著录，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三章《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1921-1931)》，共分四节。第一节认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滥觞决非偶然，而是同五四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史前考古学与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相吻合，也同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解放思想的内涵相一致，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的破坏为以考古发掘材料作基础的新古史的构筑创造了条件。第二节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史前考古活动，以1921年沙锅屯和仰韶村的发掘作为本期开始的标志。从田野实践和有关史前考古文献的统计两方面入手，分析了该时期中外考古学家的工作

量及工作范围，指出虽然中国成立了自己的专门考古研究机构，但主要的田野工作是由外国学者主持或从事的，强调了外国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在人才培养、材料积累等方面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诞生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指出中国史前考古学在发现和研究方面严重倾斜，广大的江南和华南地区几乎无人涉足。第三节认为仰韶文化的发现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肯定了安特生确立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贡献；指出安特生、阿恩等人从彩陶的比较得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被中外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该时期史前文化研究的显学，本节叙述了这一过程并对之进行了分析和评述。第四节对史前考古学在方法和技术上的贡献进行了初步总结。指出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带有浓重的地质学色彩，分析了采用水平层方法发掘的局限性和必然性，肯定了安特生、李济、梁思永等人应用类型学原则对仰韶文化断代与分期的贡献，认为这一时期开创的地质学传统、人类学传统、多学科合作传统为以后的考古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史前考古学避免了许多弯路。

第四章《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1931-1937)》，共分三节。第一节从田野实践和文献统计两方面入手，指出中国史前考古学蓬勃开展，中国考古学家的田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学者垄断了东北和台湾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试图向华北渗透；西方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日渐式微；良渚文化的初次发现开始扭转中国史前考古学在发现和研究上的地区倾斜，第二节分析了龙山文化发现的文化背景，指出在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基础上建构的所谓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学说统治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界。第三节论述了旧石器时代考古采用考古学发掘方法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采用文化层发掘方法的过程和必然性，指出后岗三叠层发现之后，文化层的发掘方法开始普遍为中国考古学家所采用。众多的考古学家应用类型学方法分析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异同，这种分析大多停留在定性对同一文化不同地区的异同的辨别上，而对同一文化本身的发展变化则很少涉及。

第五章《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继续发展(1937-1949)》，也分三节。第一节指出因为日本侵略及内战的关系田野考古活动的衰落。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几个有限的地点，日本学者在其军国主义之后把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范围扩张到华北甚至长江流域，西方学者的田野活动几近停止，战争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创伤。第二节指出在二元对立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许多学者通过对史前文化的具体分析，正确地辨别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的相互关系，从年代学的角度入手，在相当程度上推翻了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六期的体系，并对二元对立的学说发生了怀疑，中国史前文化的不平衡性和多元性初见端倪，仰韶文化西来说基本上被否定。第三节论述中国史前考古学在类型学和地层学方面的进步，认为史前文化特别是同一文化本身的发展演变得到重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基本形成。

正文约十八万字；文后附图表及参考文献。

Title of the Dr. Degree's Thesis: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China (1895-1949)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 Xing-can was born on December 12, 1964.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 An Zhi-Min.

Key Words: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Yangshao Culture, Longshan Culture,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 Stratigraphy, Chronology, Typology, Neolithic, Palaeolithic, Periodization, Excavation.

Abstract: Focused 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present dissertation is designed to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before 1949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namely Preparatory Phase (1895-1921), which is symboliz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by the investigation done in 1895 by R. Torii—a Japanese archaeologist on the Peninsula of Liaodong; Come-in-to-existence Phase (1921-1931), began with the excavation at Yangshao village in Henan Conducted 1921 by J.D. Andersson—a Swedish archaeologist; Development phase (1931-1937), marked as the turning point by the discoveries of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 Culture and the three Culture/deposits which are Yangshao, Longshan and Shang Cultures superimposed one upon another in 1931; and On-developing Phase (1937-1949) started with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of China. The author sums up the field work and features in each phase; analyses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techniques and methods and touches on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onducted the studies of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even though there had existed sparse field work on prehistory by 1921,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that the Chinese experienced no

stone age was prevailing among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finding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proves the Chinese has her own prehistory. But owing to the fact that Andersson, based on the similarities of certain designs on Painted Pottery, held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derived from Near East or Central Asia, before 1931 it was prevalent that the Chinese prehistoric culture came from the West. It was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in 1931 that made people realize that in East China there existed another Culture, which is closer to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n the Yangshao Culture. Therefore the theory that Yangshao Culture and Longshan Culture survived side by side took shape in 1930's and lasted for nearly 40 years. The Contents of the Yangshao site and Andersson's periodization of Yangshao Culture were conducted as early as 1937. After 1937, many archaeologists approached from chronology and made clear the relations between Yangshao Culture and Longshan Culture, Yangshao Culture and Qijia Culture, repulsing "six-phase periodization" and Western Origin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They also cast doubt on the contemporary existence of Yangshao Culture and Longshan Culture and reveale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multi-origins of the Chinese prehistoric culture.

Research Achievements:

1. Chen Xing-can, A preliminary research into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of prehistoric China, Cultural Relics from Central Plains (Zhongyuan Wen Wu), No. 2, 1990.
2. Chen Xing-can On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mesolithic times, Archaeology (Kaogu), No. 2, 1990.
3. Chen Xing-can, Archaeology: past and future, Academic Circles (Xue shu Jie), No. 5, 1990.
4. Chen Xing-can Bump-harvest magic and ancestral worship: on the female figures from the Hongshan Culture, HuaXia Archaeology (Huaxia KaoGu), No. 3, 1990.
5. Chen Xing-can, "The New Archaeolog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Journal of Pingyuan University, No. 3, 1989.
6. Chen Xing-can, On the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 3, 1991.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关于史前考古学的若干一般问题	(1)
第一节 “史前”概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1)
第二节 史前史与史前考古学的联系和区别	(7)
第三节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的研究简史及分期	(8)
第二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萌芽(1895-1921)	(16)
第一节 中国文化西来说及其分析	(16)
第二节 近代考古学知识的传播	(19)
第三节 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探险和考古活动	(23)
第四节 金石学及其向近代考古学的过渡	(28)
第五节 中国古代对史前遗物的认识	(33)
第三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1921-1931)	(41)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	(41)
第二节 主要考古活动的概述和分析	(46)
第三节 中国史前文化及其西来假说的由来和分析	(58)
第四节 技术方法的得与失	(71)
第四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1931-1937)	(97)
第一节 史前考古活动的蓬勃兴起	(97)
第二节 二元对立——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106)
第三节 地层学方法的完善和类型学方法的初步形成	(118)
第五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继续发展(1937-1949)	(137)
第一节 田野考古活动的衰落	(137)
第二节 年代学的突破——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143)
第三节 地层学的进步和类型学方法的完善	(159)

主要参考文献

附表及插图目录

表一、安特生在中国北方的主要考古活动

表二、1921-1931 年中外考古学者及其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统计(依安志敏1951年制,下同)

表三、1932-1937 年中外考古学者及其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统计

表四、1938-1949 年中外考古学家及其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统计

表五、1921-1931 年中外考古学家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地区分布

表六、1932-1937 年中外考古学家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地区分布

表七、1938-1949 年中外考古学家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地区分布

表八、依水平层位方法统计遗物的对比(依安特生1947年; 梁思永1930:

Nelson, 1916; Willey & Sabloff, 1974.)

表九、1928-1931, 1932-1937 年中研院史语所田野工作人员的对比(依石璋如1952年制)

表十、吴金鼎所制史前遗址编年表(依吴金鼎1938)

表十一、西阴村陶片的分类(依梁思永1930年制)

图一、1921-1931 年中外考古学者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地区柱状分布(依安志量1951年制, 下同)

图二、1932-1937 年中外考古学者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地区柱状分布

图三、1938-1949 年中外考古学者有关中国史前考古著作的地区柱状分布

图四、安诺、特里波列与仰韶彩陶纹饰的比较(依安特生1923)

图五、沙帽屯洞穴地层剖面示意(依安特生1923)

图六、仰韶村第二探沟剖面(依安特生1947)

图七、仰韶村踏沟剖面(依安特生1947)

图八、西阴村探方布局(依李济1927)

图九、西阴村地层剖面(依李济1927)

图十、西阴村遗址平面(依李济1927)

图十一、戈的演变示意(依安特生1923)

图十二、不招寨、仰韶村的龙山文化陶器(依尹达1979)

图十三、城子崖与仰韶村陶器比较(依安特生1943)

图十四、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探方布局(依贾兰坡、黄慰文1984)

图十五、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层剖面(依贾兰坡、黄慰文1984)

图十六、安阳后岗三叠层剖面(依梁思永1935)

图十七、半山的部分陶器(依巴尔姆格伦1934)

图十八、马厂的部分陶器(依巴尔姆格伦1934)

图十九、半山与马厂陶器的关系示意(依巴尔姆格伦1934)

图二十、甘肃安定阳洼湾齐家墓葬(依夏鼐1948)

图二十一、裴李岗文化的演化示意(依李济1948)

图二十二、裴文中陶器演化示意(依裴文中1947)

图二十三、苏秉琦陶器演化示意(依苏秉琦1948)

第一章 导言——关于史前考古学的若干一般问题

史前考古学已经成为人类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它在知识总量方面对人类的贡献，可以同任何一门学科媲美，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史前考古学的由来和研究范围，其中主要是“史前”（PREHISTORY）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的关系，史前考古学的概念在我国的传播等并不十分明了，而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史前考古工作者应该了然于胸，同时也是研究史前考古学史所不能回避的话题，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中国史前考古学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根据学科发展的特点对它进行分期的尝试，无疑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将有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一节 “史前”概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田野考古学的进步，史前考古学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得以确立(1)。1865年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约翰·鲁伯克(John Lubbock)在其《史前时代》一书里以“史前”为题，论述了人类的远古历史。1871年，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使用了“史前”的概念，接着，1883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也使用了“史前”一词，1868年英国《泰晤士报》正式使用这个名词，这意味着“史前”的概念不仅在考古学界而且也在一段知识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但是，“史前”一词是谁发明的呢？当时一般认为是英国学者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他在1851年出版的《苏格兰考古与史前学年鉴》一书的标题中，第一次使用了“史前”一词。后来的《牛津英语词典》以及英国现代著名考古史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他70年代以前的一系列专著中，比如《三个时代》(1943年)、《考古学一百年》(1950年)、《史前的概念》(1962年)、《人类过去的发现》(1967年)、《考古学的起源和成长》(1968年)和《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975年)，都把威尔逊当成“史前”的发明者。其实，第一次使用“史前”概念的人应该是法国学者吐纳(Tournaï)，1833年他用pre-historique一词表示当时在法国南部发现的与已经绝灭的动物化石共存人骨的年代(2)。这个考古学史上的发现最终引起格林·丹尼尔的注意，1951在其《考古学简史》一书中改正了以前的误解(3)。尽管如此，西方学术界仍然认为史前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名字出现，还应该始于威尔逊的《苏格兰的考古与史前史年鉴》一书(4)。

史前的概念虽然久已被学术界所接受，但对其内涵的认识却很难一致。更有一些学者反对或从不使用这个概念(5)。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Prehistory 是一个组合词，pre是前缀，意

义为“在……之前”，history即“历史”，是词干，所以Prehistory直译即为“历史以前的历史”。只要是人类历史，本无所谓“史前”“史后”之分，但在历史科学中，历史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指人类以往全部的发展过程；狭义的历史(History Sensu Stricto)则仅仅是指能够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那一部分人类历史(6)。

人类对历史的兴趣，大概在有了自觉意识之后就产生了。“史前史”的诞生，实际上标志着欧洲史学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十六世纪的德国史学界，把人类按照四个帝国划分，即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十八世纪的英国，把历史划分成古代史(Ancient)、中古史(Medial)和近代史(Modern)，但是，随着近代欧洲考古学的兴起，人们逐步认识到在所谓的古代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无文字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史前史作为一门科学才能成立，而“史前”一词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

史前的概念最先由英国和法国传开，欧洲其余各国也创造了相应的译名，Prehistory(Pe'histoire)的德文是Vorgeschichte，意大利文是Preistoria，丹麦文则是Oldtid——也即古史(Old times)，都代表着人类历史上古老的或最古老的时期(7)。但是在英国，Prehistory一词在当时曾被用antehistory代替，1865年鲁德克创作《史前时代》一书时，就曾考虑过用antehistory，但他最终选择了prehistory。同年，在意大利召开的考古学会议上，成立了人类学及史前考古学国际联合会，提出用古民族学(Palaeo-ethnology)意大利人缩写成(palethnology)，代替史前学的概念，但是“史前史”或“史前学”最终还是被保留下来并取代了上述昙花一现的命名。

史前史是文字产生以前历史，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因为文字的出现，文字的实际利用以及在保留给我们研究时的情况方面差别很大，又有人在历史与史前史之间加了一个“原史”的阶段。这实际上是关于史前史下限的讨论。原史(protohistory)直译应为“最初的历史”。如果历史是有文字的历史，那么原史当也是研究文字时代的历史。对于这个名词，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丹尼尔认为所谓原史，即文字已经产生，但是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实物资料与文字同等重要，或者比文字还重要(8)。另一位考古学家霍克斯(C. Hanks)认为，那些产生了文字但把文字用作非常领域(如宗教)的社会，或者把文字写在某种材料上而这种材料又没有保存下来的社会，或者一些没有文字但是历史却多属拥有文字的社会所记录并保存下来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历史应该称为原史或“类史”(Parahistory)(9)。日本考古学家水野清一、小林行雄更简捷地指出原史系“可利用文献的不完备时代”(10)。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但这并不能截然划分出一条线来，因为文字的产生与利用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文字的遗留保存也随埋藏的环境相关，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世界史学界关于史前史的具体范围并无统一的深议。比如近谋尼文明已经产生线形文字，但许多学者仍把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划入史前的范围(11)。西方史学家的某些

著作还把高代当成中国的史前时期。

史前史的建立是以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C. J. Thomson)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说为基础的。史前史的研究自然应该包括这三个时代(12)。1865年,鲁伯克从法国考古学家吸取了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打制石器时代(Periode de la pierre taillée)和磨制石器时代(periode de la pierre polie)的划分方法,创造出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 Age)和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这两个名词(13)。旧石器时代的概念一经提出,有人根据考古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文化遗物对年代作了更进一步的划分。克里斯蒂(Christy)最初把石器时代划分成①最古时代即洪积层或砾石层中的石器时代;②洞穴中发现的石器时代;③最晚阶段即地表发现的石器时代。后来拉代(Lartet)根据古生物化石把法国南部洞穴分成三个时期,即①犀牛期;②洞熊和猛犸象期;③驯鹿期。在此基础上,法国著名考古学家莫尔蒂耶(G. de Mortillie)根据考古发现的文化遗物对法国南部旧石器时代进行了分期。在1869-1883年完成的《石器时代各时期的分类》一书中,他把旧石器时代分成五期,早期的前期是舍利(chellean),后期是阿舍利(Acheulian);中期叫莫斯特(Mousterian),晚期的前期叫索累特(Solutrean),后期叫马格德林(Magdalenian)。再后来,法国另一考古学大家布日耶(Bruill)又在莫斯特与索累特期之间加上了一个奥瑞纳期(Aurignacian),变成六期,这便是欧洲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标准分期(14)。

1866年,韦斯特罗普(H. Westropp)提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Age})的概念。1872年他在其著作《史前时代》一书中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但是他的所谓中石器时代是连接早期旧石器时代和晚期旧石器时代的,因而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892年英国考古学家艾伦·布朗(A. Brown)在考古学会宣读的论文中,用中石器时代代表一种燧石的聚合物,他认为在年代上这种聚合物是介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后来这种看法得到考古发掘的验证,这样,中石器时代的概念遂被学术界所接受(15)。

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分期以蒙德里斯(O. Motellius)在北欧的工作最有影响。但是,由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远远超过旧石器时代,所以他的分期标准并未被广泛采用。

十九世纪后期,意大利考古学家倒是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遗存。他们使用“后新石器时代”(eneolithic)命名这个阶段。法国、德国的考古学家也发现了青铜工艺与红铜工艺的差别。在1875-1876年出版的《青铜时代》(L'Age du Bronze)一书中,考古学家强特里(Chartrre)提出在青铜时代之前曾有过一个红铜时代(Copper Age)。不过一般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Aeneolithic或 Chalcolithic Age),指明是由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也有人将之归入初期青铜器时代(16)。从红铜到青铜再到铁器时代,欧洲考古学家又作了许多分期的尝试,史前史的研究范围在欧洲基本上廓清了(17)。

史前史的概念传入中国是在清朝末年。1901年,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梁启超准备撰写一部新的中国史,他先做《中国史叙论》(18),以说明他编写中国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专门有“有史以前之时代”一节,介绍了汤姆逊的“史前三期”说。他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

近所订定而公认为，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次，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以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两石刀期，其所经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转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邈哉邈乎，远在洪水以前，有断然也”。很遗憾，梁启超并没有在这个提纲之后撰写出一部新中国史来，不过，仅就《中国史叙论》关于史前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知道：①梁启超接触的史前概念相当全面，除了把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一起看作“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不太符合实际外，相当准确地介绍了史前各个阶段。②认识到史前诸期在“各地长短久暂”的不同，即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说明梁氏当时受到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最新影响(19)。或者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他自己对于人类历史的一种体会。③梁氏第一次用近代考古学的概念，为中国史前史进行了分期。虽然他主要是依据神话传说，把神农之前划入石器时代，把神农以来划入铜器时代，但他已认识到中国必有实际上的石器时代。只是因为“中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但是这是“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也”。这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的确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无怪乎西方史家对梁启超作那么高的评价(20)。

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署名袁甫，在《译书汇编》杂志上发表了《史学概论》(21)，他以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方法论》为粉本，又参考其他史学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部著作，在谈到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时，他说“一般所谓考古学者，常分为书契以前与书契以后之两部。自人类学者言之，则书契以前之一部为最重，而自史家之眼观之，则书契以前尚为无史之时代，以关系较小，无待探求，而历史上所谓考古学史，其意味必为书契之后之考古学”。日本的考古学兴起于明治维新时代(22)，从上述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近代考古学在人类学和历史学归属上的差异(23)。汪氏在这里用“书契以前”指代“史前”，用“书契以后”指代“历史”，实际上比梁氏的介绍更能被人们所接受。这大概是第一次对史前和历史两阶段作如此清晰的划分。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汪氏还是把“考古学”一词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1903年，刘成禺在《湖北学生界》杂志发表《历史广义内篇》(24)，辟有《在史以前之人种》一章，1907年吴洲民在《学报》上发表编译的《史学通义》，专辟有《有史以前之叙述》一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概况。其中除了指出这门学问始自“五十余年前”外(25)，特别提到威尔沙鲁即三期说发明者之一的沃尔姿(J. J. A. Worsaae)和兰波奇氏(即鲁伯克)，介绍了史前的分期等问题(26)。

二十世纪初叶，虽然已经发现了甲骨文，但研究则刚刚起步。上述诸学者或是编译西方的史前史概念，或是用它套在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历史上(如梁启超)，虽草率疏漏，不可没，但能够真正把中国远古历史按西方的史前概念进行分期的，恐怕只能等到考古学诞生之后。受过西方近代科学训练又对中国古史熟悉的胡适，在1923年5月寄给胡适的信

中，接受了安特生(J.D. Andersson)的观点，把商代划入“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而把周秦楚划入铜器时代(27)。顾颉刚在1925年的答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中指出，“我以为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他，虽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他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他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在遗作品之下。我们现在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已有有史时代，载记的地位已不可一笔抹煞”(28)。顾氏用无史指代史前，并认为商周已经进入有史即历史时期。这是历史学家中比较早地应用最初的考古资料对中国上古史进行分期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认为中国真正的历史时期，既不始于唐虞，也不始于黄帝，而是始于商代。他说“中国的古物属于有史时期的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的末年可以说还是金石并用时期。”又说：“在商代都只是金石并用时代，那末在商代以前的社会只是石器时代的未开化的原始社会，那是可以断言的。因为文字的发明及诸多的考古发现，所以他断定“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头！”(29)郭氏的理论既受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的直接影响，又受到西方考古学界史前考古学分期的影响(30)，所以其中频频使用了原始社会、氏族社会以及石器、金石并用、青铜时代等不同体系的概念。但是，很明确，尽管他说商代还是“原始公社社会”，但是真正的历史却是从商代开始的，即商代之前才应该是史前时代。同样，他认为周代属于青铜器时代，但同时又指出是奴隶时代。他说，“人类进化史的初期由石器时代而金石并用时代而青铜器时代而铁器时代，这已经是既明的事实。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在下辞的研究里业已叙述，我们现在可以用坚决的态度断定周代是青铜器时代”(31)。郭氏在读到《古史辨》第一册中胡适关于商代是石器时代的论断以后，指出安特生所谓商代是石器时代晚期，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上一般是称为金石并用时代，胡适漫然地引为石器时代，并于‘石器时代的晚期’之下注以‘新石器时代’，这是大谬。盖新石器时代为期至长(单言石器时代更无庸说)，早的如埃及开幕于公元前一万二千年，中国的绵延有六千年。其他欧美各国，大抵均开幕较迟，而绵延却约略相等，中国的地质学上的时代，在目前科学的发源方法在萌芽之时，自然也说不出它的定限，然而殷代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32)。从理论上讲，这个批评还是恰当的。郭氏对于胡适把周秦楚视为铜器时代，也作了批评。他说：“以周秦为‘铜器时代’亦是错误。在考古学上，铜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判然有别。铜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便是金石并用时代的另一种说法。青铜器时代则是更高级的文化，周秦确已是青铜器时代”。郭氏把旧石器与新石器、新石器与铜石并用以及铜器与青铜器时代分开论述的意见，体现了西方史前分期的理论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初步成功的结合。

正是由于二十世纪初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欧洲史前诸阶段以及其他史前考古学的概念才终于在中国扎根。“史前”一词既被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应用，也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应用(33)。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五十年代的“史前”一词的争论，有人认为是

是资产阶级的术语，“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应当弃之不用(34)。这种意见同苏联十月革命后部分学者对“史前”所做的批评具有相似性，实际上是承袭了苏联人的说法。解放后我国翻译出版的诸多苏联著作，如尼科斯基《原始社会史》、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以及蒙童特《苏联考古学》等，都对史前史采取批评态度，认为它割断历史，把人类的原始社会排除在人类历史之外。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有利用“史前”一词以便把没有文字的部落划出人类历史之外，并将原始社会的研究划分开来，另外称之为“史前学”的，以为没有文字的民族便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是种族主义的理论，应当批驳。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早有批判(35)。但是，应当承认，“史前”一词从构词到内涵，其特定的意义在大多数西方史学家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们自己也有争论，但反对的只是认为用词不当，并无太多的非议(36)。在我国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有关史前一词的争论中，一些著名学者如日知(37)、裴文中(38)、夏鼐(39)都曾坚持“史前”一词可以使用，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一十分方便的术语，在解放后的三十年中却很少使用。

1983年《史前研究》创刊，这标志着我国史前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解脱了“左”的桎梏，进入了一个繁荣的阶段。1985年，有人以《为“史前”正名》为题，指出以文字的出现作为划分史前的界线是不科学的，认为史前是指“从猿转变到人开始，至阶级产生和国家出现为止”(40)。但是，这种意见，既不符合已经约定俗成的史前概念，把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作为史前的下限，又增添了新的麻烦。因此还是维持原来的含义为好(41)。

由于解放以来田野考古学的发展迅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和发掘，使得中国何时进入历史时期的争论并未停止。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七十年代的《史前文化的鸟瞰》(42)一文中，对史前的范围颇费踌躇。他说“我们可以说凡是有文字记录历史以前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史前史’……不过，这一定义，也可引出些不少的困惑，因为以现代存在的文明古国历史论，差不多每一国所记载的古代史，都杂有一长段传说的神话故事，为后代人的追述或伪造。这一情形的普遍存在，就引起下一难题：所谓记录历史的开始，是否包括神话历史在内呢？这确是史学家的一个大难题”。他虽然承认唐虞夏商各代“都是自孔子以来大家所认为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而在秦以前就有记录的”，但他又指出：最近的田野工作，“所发见地下（有文字记录的）材料，最早的只能到商代的中期，时代在盘庚迁殷以后，若是照现代考古学的标准说就可以把盘庚以前的传说历史都算在史前史范围以内了”。他又指出“不过这一办法也并不能解决内在的困难；理由是殷墟并不代表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而中国文字的发展，就殷墟的书架所表现的话，显然有个长远的背景——而且这背景也必定是中国民族在远古时代生活的一种反映，同时也应该是见于文字的”。有鉴于此，李济建议中国“史前史”的第一个“史”的界线，定在商的先公先王时代，比这一时代早的夏朝以及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其他传说时代，拟定为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史，仍列入史前史的范围。

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考察了二里头、偃师与郑州、安阳高城的情况，他总结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和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墟文化，都有前后承袭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

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43）。近年来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也可视为关于史前下限问题的讨论。夏鼐的观点虽然并不代表全部的意见，但在目前田野发现的基础上是可以接受的，故本文的讨论范围也以此为准则。

第二节 史前史与史前考古学的联系和区别

史前史(Prehistory)或作“史前”，但在汉语习惯上，史前总象一个形容词，它后面必有一种主词才易被人们接受，如“史”、“期”、“考古学”、“文化”等等，在英文里，史前考古学是作“Prehistoric Archaeology”的，那么，史前史是否等于史前考古学呢？从词源来讲，史前史是以田野考古学的三期说为基础的，而且人类关于史前的知识几乎全都来自于考古发现，所以一度有人认为史前史就是史前考古学(44)。两个词具有同样的性质。

但是，严格来讲，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早在考古学的滥觞时期，考古学家就注意到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神话传说等对史前研究的重要性。与汤姆逊同时代的另一位丹麦考古学家、动物学家斯温·尼尔森(Sven Nilsson)，在1838年发表的《斯塔的那维亚北部的原始居民》一书中指出：对考古器物进行研究并不是获得史前知识的唯一途径。他强调传说以及称为比较方法的重要性，“能够反映远古时代光芒的证据，我认为不仅仅是各种形式的文物古迹，以及刻画在它们上面的图形，而且还应该算上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往往产生于传说，因此也是远古时代的遗存”。他十分强调使用比较方法，即比较史前的人工制品与现代原始民族所使用的具有相同形式和功能的器物。尼尔森应用比较方法，创立了一种按生存方式为基础的史前史分期法。他把人类发展史划分成四个阶段：一、蒙昧阶段，人类的童年，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活手段；二、游牧阶段，人类的青年，以畜牧业为生，另外依靠小部分猎物；农人阶段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为文明阶段，其特点是铸币、文字的发明和劳动的分工(45)。他虽然没有把这种分期法与石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密切结合起来考虑，但是这种分期法是后来泰勒、摩尔根、恩格斯以及苏联和我国以生存方式划分史前时期的先声。丹尔尼认为这个分期法比“同时代丹麦人的三期说更符合于历史”(46)。正是由于人类学与比较民族学在研究史前文化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在1865年才有人提议用古民族学代替史前学。而英国在1840年至1870年的史前考古学成绩都出在地质学部和民族学部(47)。实际上，从泰勒、摩尔根到恩格斯的著作对当时甚至直到今天的史前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决不在史前三期说或任何一种理论之下。而这些学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比较民族学、民俗学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另外，体质人类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等对史前史的研究也被出过贡献。有人还把比较语言学当成史前史的基础(48)。威尔士的学者约翰·里斯(John Rhys)在其1882年出版的《凯尔特时代的英国》和1909年出版的与他人合著的《威尔士人》两书中，完全不提考古材料，在解释威尔士史前史时一味用语言学和历史学材料来解释的史前民族。因此

利亚人、盖耳人和古不列颠人(49)。民族学家和某些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对史前史的不负责任的说教，在当时就曾受到指责。马克思·米勒(Max. Müller)写道：“在我看来，一个口口声声称雅利安人、雅利安血统、雅利安眼睛和头发的民族学家，其荒谬程度无异于一个语言学家侈谈什么长头形人辞典或者圆头人语法”(50)。尽管某些学者滥用考古学之外的其它方法对史前史的研究带来了危害，走向了目的的反面，但是正如丹尼尔评论的那样：“考古学提供了人类的技术经济史，但研究人类历史的学者不仅想要了解人类工具发展的过程，还想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以及人类思想道德观念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学家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攫取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所推论的结论。又为什么到现代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寻找答案”。他认为沃尔赛和尼尔森强调比较民族学对史前考古学的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考古学如果不把考古遗物与现代原始民族的使用方法相联系就无法理解人工制品的用途。寻求史前与现代人工制品之间形式与功用上的一致性当然有可能办到，双方研究材料的吻合，使得考古学家欣喜万分；在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又因为屡屡不能从考古证据中阐发史前人类的社会与精神文化而感到沮丧”(51)。在这里，史前考古学仅仅被当成是史前人类的物质遗留的提供者，这自然同当时史前考古学还刚刚起步有关，但是史前考古学在研究史前社会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局限性(52)，注定史前史的信息来源不能仅仅取自考古学(53)。实际上现代西方的新考古学及民族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等，都是企图对古代人类的行为及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解释(54)。但是，毫无疑问，史前考古学是史前史的构架和最基本的信息来源，这一趋势随着考古学发掘和分析手段的进步将会变得更加清楚。

第三节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的研究简史及分期

中国史前考古学从1921年的仰韶村发掘算起，至今已经整整七十周年。七十年来，中国史前考古学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它的起源与发展、它的成功与失败、它的经验与教训，它和历史考古学的相互影响，它在世界史前考古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它与中国现代社会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等待着我们去分析、归纳和认真地加以总结。正如丹尼尔所说：“研究考古学史的重要性在于认识考古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一直向前进展的发现记录，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交^涉着错误的推断和伪造以及考古学家拒绝历史地对待自己工作的倾向(55)。正因为如此，西方各国把考古学史的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丹尼尔自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致力于考古学史的研究，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与《考古学简史》对世界考古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及各^国考古学史的著作之多，只要我们翻看丹尼尔在上述著作附录里的书目，就会叹为观止，更不要说散见于各种杂志及通俗著作中的言关论述了。1978年第一届国际考古学史研究会召开，这标志着国际考古学界对考古学史的普遍关注，也表明考古学史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6)。最近几年，我国考古界^{出版}了^两种^日文^译本^书，翻译了美国克里姆(C. W. Cream)著《神、陵和学者》(

987),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987)以及怀特(A.T.White)《湮没的世界》(1985)等考古学史专著及一些单篇论文;此外,郑振铎1928年出版《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29年郭沫若译《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54年以《美术考古—一世纪》重译再版)等也都对近代考古学史做过简单的介绍。这些著作虽然只是世界考古学史研究的一小部分,但对我们开阔视野,吸取经验和教训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即便是最具有世界眼光的《考古学简史》一书,对中国考古学史的总结和描述也只有片言只语,这自然部分是源于中文文献的限制,但无论如何事实上却影响甚至阻碍了人们正确地看待中国考古学史的发展。日本人水野清一所著《东亚考古学的发达》(1948)倒是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中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但是该书对中国学者所做工作的叙述占很少的比重,也难以反映出真实情况。日人三宅俊成著《满蒙考古学概说》(1944年)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但偏于一隅又仅系罗列材料也难以反映出真实的情况。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学史著作甚少,早的有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1925)分别叙述了甲骨、简牍、经卷、大内档案以及边境发现的少数民族遗文。稍后,梁启超作《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和将来》(1926),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1977年收入《凡将高金石论丛》出版)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的总结。真正对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进行总结的有1933年出版的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和1937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史》,这两本著作虽然罗列多分析少,水平不高,但正如李济在《中国考古小史》序言中写的那样,“使读者一阅而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事实”(57),开创之功,实不可没。另外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有关史学史的著作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到近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学基础》(1958)一书专辟一章由徐莘芳论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另外如《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或是分专题或是分地区对1949年以来的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史前研究是这些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来,对中国近代考古学发生时期所作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胡厚宣《殷墟发掘》(1950)、安志敏《中国史前考古学书目》(1951年初版,1983年日本重印)、徐莘芳《考古学简史》(1958)/李济《安阳》(1977年英文版)(59)、夏鼐《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1979年)(60)、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1983)(61)、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1984)王世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1986)撰著的《中国考古学年表》、《中国考古学简史》等著作。

中国史前考古学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的起源和发展不能孤立进行,在讨论史前考古学发生阶段的认识的问题时尤为如此。因此,对史前考古学发生时期的时代背景也可以相当程度地认为是对整个中国近代考古学发生的认识,准此,在讨论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史前考古学之外的东西。丹尼尔冠以《考古学一百年》的著作其用意主要在于“探讨近一百年所谓史前史的发展情况”(1950),但却不时地涉足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这也说明考古学内在的联系是很难被割裂开来的。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所做的专门研究,除了安志敏《史前考古学书目》、贾兰坡、黄慰文

的《周口店发掘记》之外，再就是严文明在北大讲授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教程（未编版）。另外，李济、夏鼐、尹达、裴文中、贾兰坡、苏秉琦、安志敏、王仲殊、佟柱臣、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张森水、俞伟超、王世民、张光直、刘敦愿、黄慰文、黄景略等撰写的有关中外考古学家的传记和纪念文章，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前辈学者的工作历程，为本文作者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本文作者愿意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起源和发展做一些初步总结和探讨，以有益于更多的考古学者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展望未来。因为时间和精力所限，本文对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的讨论先截止在1949年以前，而且偏重在中国文化起源的研究方面(62)。

关于史前考古学史的分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的起始年代；其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分期与整个近代中国考古学史分期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外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论述颇不相同。三宅俊成、水野清一把鸟居龙藏1895年在放勋地区的考古调查当成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开始(63)。尹达在1939年写作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现和研究，“已经有近二十年了”(64)，因为1939年距1921年接近20年，所以他很可能是以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为开始标志的。在写于1939-1940年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中，虽然新石器部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几乎无异，但却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已经二十多年了”(65)。很显然，尽管他认为“在中国境内第一个作考古发掘并加以研究的要算是瑞典人安特生”，但在事实的罗列上他却认为鸟居龙藏在东北的调查远早于安氏并且例举了鸟居氏1915年用法文写作的一篇论文，我们推测尹达在这里并不认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开始于1921的安特生，而是更早。若以1911年的仰韶村发掘为界，那么就应该是近二十年而不是二十多年了。在写于1954年的《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一文中(66)，他又指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很显然，他是把仰韶村和安特生在甘、青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及日本学者在东北的工作排除在外的。我们分析他是以李济1926年的西阴村发掘作为新石器时代研究开始的标志的，不过他没有说明罢了。这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7)。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仰韶村的发掘代表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开始。这种观点可以李济和夏鼐、王仲殊(69)为代表，已被学术界所接受。由于中国的田野考古学开始自新石器时代考古，所以我们讨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实际上也是包括整个旧石器、新石器及铜石并用时代的整个史前考古学开始的标志。

关于史前考古学的分期，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和展望》⁽¹⁹⁶³⁾中给新石器时代考古作了分期。他认为从1920年到1927年，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正处于萌芽状态。“一个外国人开始在个别地区作了调查，试掘了个别遗址；这部分资料大都运往国外，文章大都用外文发表，间亦附有汉文翻译；到现在那批遗物还流落在国外。当时个别中国人在外国的所谓学术机构支配下，曾经在个别地区进行过简单的发掘工作”。第二期是1926-1937年，这期间中国学术机关曾经进行了某些调查工作和发掘。第三期是1937-1949年，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处在“停顿状态”。1949-1954年，是考古学的发展期，发现了三百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